

流动的老年：“老漂族”的形成机制 与多重角色困境



许加明^{1,2}, 华学成²

(1.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摘要 “老漂族”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的一个新兴族群,具体是指为了与子女团聚或者帮助子女分担家务、照顾孙辈而从农村老家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老漂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结构性力量的交互影响,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保障的倒逼、传统文化的推拉和国家制度的规制。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的“老漂族”面临着多重角色困境:在家庭角色方面是核心家庭中的多余人,在代际关系方面是重心下移中的边缘人,在日常生活方面是地域冲突中的异乡人,在社区交往方面是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在社会地位方面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面对多重角色困境的“老漂族”,未来无论是去还是留,都存在多重障碍与羁绊。

关键词 人户分离; 形成机制; 角色困境; “老漂族”; 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C 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8)05-0039-10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8.05.005

迁移流动是人类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之下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倾向,游牧民族一直有着逐水草而居的历史传统。然而,大规模的迁移流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景观,则是滥觞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人口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逐渐增强,不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五六十年代前出生的老年人,从两侧对中年流动人口形成了一种包抄和挤压之势,从而在年龄上形塑了一种“三明治”式的流动人口结构。据统计,2015 年我国流动老人的总量近 1 800 万人,占流动人口的 7.2%,其中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比例高达 43%,为与子女团聚或异地养老而流动的比例为 25%^[1]。这些主要为了照顾孙辈、家庭团聚或异地养老而背井离乡来到陌生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被形象地称为“老漂族”。

“老漂族”通过流动改变了家庭生命周期的正常运行轨迹,组建了一个临时主干家庭^[2],从而实现了家庭成员的团聚,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子女都带来了极大的流动福利。一方面,对于“老漂族”自身而言,通过与子女共同生活,可以得到子女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从而异地重建因子女的流动而崩离析的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模式,得享天伦之乐;另一方面,对于“老漂族”的子女而言,通过与父母共同生活,可以得到父母在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等方面全方位的生活照料,从而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轻装上阵。然而,“老漂族”从熟悉的乡土进入陌生的城市,必然要忍受背井离乡的苦楚,遭遇城市适应与社会融入方面的困境。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老漂族”被迫解构旧的生活方式、重构新的生活方式,在利弊的权衡和新旧的博弈中艰难地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对“老漂族”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和梳理的基础上,从市场、社会、文化和国家四个层面建

收稿日期:2017-09-1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面二孩’政策对江苏人口变迁的影响研究”(16SHC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苏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2017ZDAXM01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城市家庭结构变迁背景下‘老漂族’的城市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研究”(2016SJB84002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苏北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2017ZSTD018)。

作者简介:许加明(1981-),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构“老漂族”的形成机制,深入剖析“老漂族”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存在所面临的多种角色困境,以期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一、“老漂族”的概念及特征

1.“老漂族”的概念

“老漂族”是当今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殊群体^[3]。“老漂族”的称谓非常之形象:老,是年龄方面的限定;漂,是对人户分离的表征;族,是同质性概括。因此,从字面上来理解,“老漂族”是对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在外地生活的一类老年人的统称。然而,这种字面上的理解过于宽泛和笼统,不利于对这一新生族群进行聚焦和深描。

就目前来看,国内有关“老漂族”的文献以媒体相对简单且浅显的社会报道居多,重在描述此类社会群体的存在。学术界对于“老漂族”也尚未形成明确具体的概念界定,只是从某个或某些方面对其部分属性特征进行了相应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年龄方面,不仅包括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包括 60 岁以下的准老年人^[4];第二,在户籍方面,处于居住地以外的省市^[5];第三,在漂的方向方面,从自己生活的农村漂向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6];第四,在漂的动机方面,为了帮衬子女特别是帮助子女照顾第三代^[7];第五,在漂的时间方面,在现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且在几年之内往返于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多次^[8]。

综合考虑年龄、户籍、流动距离、流动动机和流动时间等诸要素的特征,可以将“老漂族”具体界定为:年龄在 50 周岁及以上,为了与子女团聚或者帮助子女分担家务、照顾孙辈,跨越省市之界从农村老家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居住达半年以上,户籍不在本市且未发生迁移,经常往返于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之间的老年人与准老年人群体。

2.“老漂族”的特征

“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口空间移动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以“人户分离”为根本特征的人口流动状态,并因此形塑了规模庞大、类型众多的“漂族人口”,如“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等。“老漂族”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漂族人口”,相对于传统“漂族人口”——“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等而言,具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第一,“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形成的一个城市聚合群落,其聚类的主要标志是“漂”在相同的城市之中,属于一种实际群体;而“老漂族”则是散落于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中,其聚类的主要标志是在相同的年龄“漂”,属于一种统计群体。

第二,“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主要是 50 周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又以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居多;而“老漂族”则主要是 50 周岁及以上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其中又以女性老年人居多。

第三,“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是为了谋求自身更好地生存或发展机会而“漂”,属于主动型和利己型的“漂”;而“老漂族”则主要是为了照顾子女特别是抚育孙辈而“漂”,属于被动型和利他型的“漂”。

第四,“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的“漂”导致了家庭成员的分离,家庭的完整性因此而遭受破坏,家庭成员天各一方,不利于家庭的稳定和发展;而“老漂族”的“漂”则促成了家庭成员的团聚,家庭由分裂重归统一,原本身处两地的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相聚到一起,得享天伦之乐。

第五,“北漂族”、“沪漂族”、“广漂族”的“漂”是以未来为导向,渴望终有一天能够落脚在“漂”的城市,以扎根城市为目的;而“老漂族”的“漂”则是以过去为导向,扎根城市并非他们“漂”的目的和初衷,绝大多数人都在期盼终能够早日完成“漂”的使命而重返故乡。

二、“老漂族”的形成机制:市场、社会、文化与国家

“老漂族”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故乡与他乡、父代与子代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博弈与妥协的产物,他们的存在更加清晰地折射出了中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市场经济、社会保障、传统文化和

国家制度等多重结构性力量对于个体的裹挟和形塑,“老漂族”的形成正是这些结构性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1. 市场经济的冲击

市场经济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不受国家行政力量控制,而是依靠自由市场价格机制引导的经济体系,因追求效率且能够增进社会整体利益而受到鼓励和发展。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以其极具活力与效力的运作方式和结果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世界,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在其影响之下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城市。

市场经济以工商业为最早起源方式,利用城市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源向城市区域流动,为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原动力^[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生活条件的改善、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多,激发了农村人口对提高生活品质、知识素养和劳动报酬的强烈愿望,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借助求学或务工经商等途径涌入城市。他们一旦在城市站稳脚跟,大都想要把农村父母接到自己的身边。这或许是出于对父母的一片孝心,也或许是出于照顾自己以及子女的需要。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大都是独生子女,独立生存能力比较差,对父母的依赖性非常强,进一步提高了进城子女带动农村父母进入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据数据显示,人口流动整体上已经呈现出稳定性和家庭化的趋势^[1]。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人口流动大潮不仅影响到了农村的青壮年人口,也波及了老年人。他们在进城子女的带动之下,被动地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当中来,成为一种社会性流动人口。

市场经济一方面引发了部分农村老人被动进城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部分农村老人主动进城的意愿。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同时,其与城市的天然亲和力日益显现,使得城市越来越发达,并对传统小农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农村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资源优渥、日新月异的城市与贫困凋敝、裹足不前的农村形成鲜明对比,使农村老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此外,市场经济引发的人口流动不仅带动了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也带动了思想和观念的流动,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开始全面侵入农村。城乡之间物质世界的强烈反差引起的心理落差,加上人口流动带来的现代观念对农村的侵袭,不断冲击着农村老人的精神世界,并逐渐瓦解了祖祖辈辈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安土重迁等封闭保守的传统思想,进而萌生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渴望。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不再坚持终生固守在家乡的土地上,而是期盼有朝一日也能体验一下城市的新生活。

2. 社会保障的倒逼

社会保障是由国家、社会以立法为依据出面举办,由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组织实施的物质援助与专业服务的事业与制度的总称,其目的是为保障民生,促进社会进步^[10]。因此,社会保障对于维系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正常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老人和儿童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对象,我国农村养老资源的匮乏和城市儿童福利的不足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进入城市。

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类型。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载体、由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社会养老是由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相对而言,家庭养老更加契合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更加容易获得老年人的青睐。但是,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强制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加剧,农村地区的空巢现象非常严重,农村老人普遍缺乏家庭成员的照顾。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导致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发育不健全,养老机构数量少、费用高,服务功能单一,服务水平低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更是严重滞后,使得很多老年人被迫进城依靠子女进行养老。

根据西方国家的惯例和经验,儿童福利主要包括儿童直接获得和通过家庭成员间接获得的福利两部分。间接性儿童福利如制定一整套家庭儿童福利规划,为父母提供生育津贴、开展公共托育服务,甚至鼓励产后带薪休假,其目的就是让年轻父母安心照顾孩子,使得孩子健康快乐成长^[11]。然

而,我国现有的儿童福利主要是面向流浪儿童与残疾儿童的救助性政策,以家庭为单位面向所有儿童的普惠型福利非常欠缺,导致城市家庭普遍陷入了一种儿童抚育困境。一方面,年轻夫妇每天忙于工作,无暇照看年幼的孩子;另一方面,虽然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托幼机构,但大都收费比较昂贵,且因为虐童事件的频繁曝光而让年轻父母望而却步。基于以上方面的考虑,农村老人便被进城子女“邀请”到家中化身为一种帮助性儿童福利,为子女安心工作和孙辈健康成长进行保驾护航,城市家庭儿童福利的不足成为倒逼农村老人进城的重要力量。

3. 传统文化的推拉

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实体与文化意识,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也是塑造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重要力量,对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与故土情结在农村老人的进城与留守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两种力量的博弈与妥协形塑了农村老人身体进城与户口留乡的“人户分离”状态。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生育和养育子女是家庭的一项基本功能,也是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习俗的角度来讲,抚养子女长大成人都是父母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父母对于子女却是承担着“无限责任”,进而形成了老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伦理”,即使在子女成家立业之后,父母仍然应该倾其所有对子女以及孙辈不计回报地付出,尽可能减轻子女的负担,与子女同住也主要是出于对子女有所帮助^[12]。在农村老人的观念世界当中,这种“责任伦理”更加根深蒂固,终其一生都是“为子女而活”,主体意识完全被消解在家庭责任之中。因此,对于那些子女进城的农村老人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进城帮助子女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后顾之忧。正是在这种“责任伦理”的驱使之下,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开始进入子女所在的城市。

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在绝大多数农村老人的头脑当中仍然根深蒂固。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有一种“根”的意识,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6]。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之下,户籍代表了一个人的“根”,户籍在哪里,“根”就在哪里。因此,对于存在故土情结的进城老人而言,城市不过是一个暂时客居的异乡,身体可以进入城市,但户籍不能离开故乡。尤其当他们固有的乡土生存法则并没有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淡化,反而在与城市生存法则产生摩擦和碰撞的过程中愈发凸显的时候,重回故土的想法便更加强烈。稳定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并不分离;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13]。因此,在陌生的城市中,“老漂族”大都倾向于选择与同乡交往,这进一步强化了其本身固有的故土情结。对于故乡的难舍之情,使得进城老人不愿把户籍迁入城市,而是选择把自己的“根”留在农村,从而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便在生命暮年能够重回故乡。

4. 国家制度的规制

国家制度是由中央政府制定、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通过引导或规范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来达到改变社会现状或取得预期结果的目的。因此,国家制度对于个体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其中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形塑“老漂族”的重要力量。

由于户籍制度的规制,导致农村进城老人不能自由地将户口迁入子女所在的城市。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严格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起来。国家开始对人口自由迁徙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并将人口管理和公共福利相捆绑,借助于单位制和人民公社等组织系统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和基层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日程,但迄今为止,自由落户仍未全面放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落户政策中的各种限制导致农村老人进入城市之后很难在当地自由落户、落地生根,被迫成为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

即使全面放开自由落户,在现行的土地制度的规制之下,仍会有很多进城老人不愿将户口迁入子女所在的城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社

会运动的洗礼,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被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所取代。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和处置权,任何私下买卖土地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近年来农村土地确权和使用权流转也开始推进,但仍然是政府主导下的计划行为,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自由流转的市场行为。在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之下,土地就是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以及收益权,赋予了农民耕种、居住、拆迁补偿等无形财富。一旦进城老人将户口迁入子女所在的城市,农村的土地将会被无偿或低偿收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因此,即便城市全面放开自由落户,很多进城老人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也不愿意落户城市,“人户分离”是他们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进行利弊权衡之后主动做出的“理性选择”。

综上所述,“老漂族”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社会、文化与国家四种结构性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从市场层面来看,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之下,人口流动日渐频繁,思想观念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当中来。从社会层面来看,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村养老资源的匮乏和城市儿童福利的不足,不仅催生了农村老人进入子女所在城市养老的愿望,也产生了进城子女希望农村老人进城抚育孙辈的需求。从文化层面来看,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推动农村老人进入子女所在城市家庭继续奉献,而“叶落归根”的故土情结又拉动他们将户籍留在农村,为自己年老之后回归故乡留下一条后路。从国家层面来看,户籍制度导致很多进城老人无法逾越城乡之间的壁垒,不能随心所欲地落户在子女所在的城市,土地制度又导致很多进城老人因为不想无偿或低偿放弃农村的土地而不愿将户口迁出农村老家。以上四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老人进城”与“户口留乡”两种现象的共存,从而在老年流动人口中出现了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现象,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老漂族”。因此,可以将“老漂族”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概括归纳为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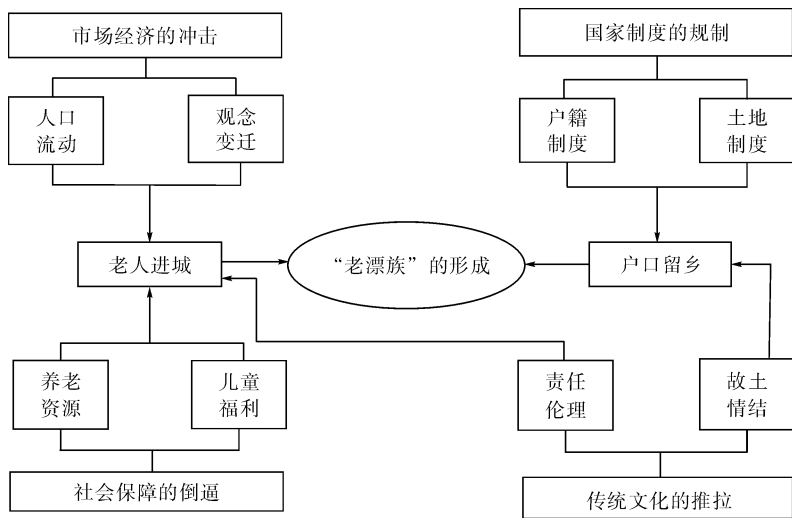


图 1 “老漂族”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三、“老漂族”的多重角色困境:我是谁?

“老漂族”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在多种结构性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他们虽然身体已经进入了城市,但是户籍仍然保留在农村,就像一颗无根的浮萍一样“漂”在异乡的城市之中,在城市与农村、他乡与故乡之间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加上自身在年龄、知识水平、人生经历等方面存在的弱势,因而面临着多重角色困境。

1. 家庭角色:核心家庭中的多余人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是社会学对家庭结构研究的经典类型学划分。“老漂族”进入子女所在的城市,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形成了一种“临时主干家庭”^[2]。这种主干家庭不仅具有临时

性,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由于户籍制度和传统习俗的影响,“老漂族”普遍缺乏对子女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子女配偶也很少把他们真正看作“家里人”,因此这种家庭只能称之为“形式主干家庭”。对于“老漂族”而言,他们不过是临时客居在子女家中的外来者,是子女核心家庭中的一个多余人。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语境之下,户籍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的合法性身份,而且是一个人的“根”之所在。对于中国人而言,户籍在哪里,家也就在哪里。“老漂族”虽然已经进入城市生活,但是户籍并没有与他们一起进入城市,而是仍然留在农村老家,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家发生了变化。此外,中国历来把结婚看作成家的标志,儿女结婚之后就会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与父母分家而自立门户,从此以后便与父母成为两家人,尤其是对于女儿来讲就更是如此。在户籍制度和传统习俗的双重影响之下,“老漂族”虽然与子女共同生活和居住,但大都缺乏对于子女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他们的主观意识当中,很少把自己当作子女家庭中的主人,一般情况之下也不会参与子女家庭的决策,自己只是暂时客居在子女家中,总有一天会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即使“老漂族”想要融入子女家庭,现实当中也往往很难实现。家庭具有情感支持的作用,与家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新城市的生活^[4]。但是,“老漂族”不只是与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而是与子女及其配偶甚至包括孙辈共同生活在一起,子女配偶的态度对他们能否融入子女家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人口流动的时代背景之下,“老漂族”与子女配偶大都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场域,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也缺乏感情基础,朝夕相处之下很容易产生摩擦和分歧,其中以婆媳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和常见。子女配偶态度上的冷淡乃至言语和肢体方面的冲突强行将“老漂族”排斥在了子女家庭之外,即使他们想要融入子女家庭当中,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接纳。

2. 代际关系:重心下移中的边缘人

在传统农业社会,受儒家孝道文化和家庭财产占有方式等的影响,代际关系的重心落在老年人的身上。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中原有的双向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被打破,代际关系的重心迅速下移^[4]。对于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际关系的重心更是完全下移到儿孙辈的身上,他们原本拥有的家长权威荡然无存,成为一个事事靠后、最容易被忽视的边缘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家长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土崩瓦解,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程度愈来愈低,家长的威信大大降低^[15]。“老漂族”离开农村老家进入子女所在的城市之后,更是完全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经济来源,一切日常生活所需都要依靠子女供给。不仅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彻底消失,而且出现了父母对子女的反向“经济依赖”。而子女结婚成家之后,早就已经实现了与原生家庭之间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从而使得“老漂族”产生心理上的亏欠感。“老漂族”在经济方面的弱势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家庭地位,并逐渐丧失了子女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经历着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旁观者”的转变。

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人类逐渐开始由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时代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以往因为掌握着代际之间口耳相传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的长老话语权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等方面日渐扩大的代际隔阂进一步淡化了老年人的家长权威。与此同时,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年轻人的发展,家庭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对子孙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上。因此,“老漂族”进入子女所在的城市之后,不再处于需要全家照顾和尊敬的优越地位,而是被排除在重要的家庭事务之外,仅仅成为了照顾全家人的“后勤保障”^[16]。他们的日常需求经常被忽视,日益被后辈的需求所取代,而且可能因为没有照顾好儿孙辈而被子女埋怨甚至斥责,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3. 日常生活:地域冲突中的异乡人

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影响之下,农村和城市类似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因此形

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图式。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老漂族”从熟悉的农村跨越省市之界进入陌生的城市,不仅意味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更是对原有生活场域的脱嵌。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巨大反差,“老漂族”的日常生活经常遭遇地域冲突,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老漂族”从农村老家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城市和农村在建设规划、建筑风格和居住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加上“老漂族”受年龄、知识水平以及人生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环境适应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城市当中高大的楼房、狭小的住宅、污浊的空气、刺耳的噪音和拥堵的交通不断冲击着他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认知,使他们愈发怀念农村低矮的平房、宽敞的院落、清新的空气、宁静的村庄和熟悉的小路;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封闭的居住方式和冷漠的邻里关系也不断解构着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图式,使他们更加怀念农村开放式的居住安排以及村民之间极具人情味的互动方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地区之间物产、气候以及习俗等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饮食口味和饮食习惯。“老漂族”跨越了省市之界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饮食口味和饮食习惯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在饮食方面与子女孙辈很容易发生冲突和分歧,并会进一步增加其日常生活中的困扰。一方面,“老漂族”几乎承担了子女家中所有的家务,包括烧菜做饭,但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原有的烹饪方式而做出符合当地口味的饭菜,因而容易招致子女尤其是配偶的埋怨;另一方面,即使“老漂族”学会了当地的烹饪方式,但自己多年形成的饮食偏好也很难改变,可能因为无法适应新的饮食口味而产生身体上的不适。正所谓“胃知乡愁”,饮食的变化也会进一步触发“老漂族”的思乡情绪,强化了其异乡人的心理感受。

4. 社区交往: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

社区是城市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初级场所,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来建立、发展和完善社区关系网络,并通过参与社区事务来培育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提高社区自治水平。“老漂族”虽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户籍仍然留在农村老家,加上年龄、语言、思想观念、知识水平等个人条件的限制,难以真正融入所在的社区当中。由此导致“老漂族”在社区交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社区参与水平低下,成为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城市当中,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居民参与社会交往、建立社会关系的基本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造成了城乡之间严重的二元对立,城里人大都瞧不起农村人,农村人也大都有着比较强烈的自卑情结,加上对陌生人的恐惧和防范心理,导致了“老漂族”的双重边缘化——当地居民对“老漂族”的边缘化和“老漂族”的自我边缘化,社区交往意识非常薄弱。即使“老漂族”愿意参与社区交往,也常常因为语言方面的障碍而难以如愿。社会交往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的综合性测量指标,语言的相似性程度越高,沟通过程就越顺畅^[17]。“老漂族”大都来自于偏远的农村,加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只能用方言与人进行交流,因而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大大限制了其社区交往的范围和频率。

社区是城市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而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是衡量基层民主建设和社区自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就目前来看,我国的社区参与主要包括社区管理参与、社区娱乐参与、社区志愿参与和社区公益参与等方面的内容。“老漂族”作为城市社区的新成员,理应作为一种重要力量参与到社区公共生活当中来,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受户籍和年龄等的限制,“老漂族”在城市中普遍丧失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他们并非有单位挂靠的流动人口,亦无业主身份,参与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缺乏合法性^[18]。即使他们被允许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也常常因为公民意识发育滞后和知识水平比较有限,导致社区参与意愿不足和参与能力低下。更为重要的是,“老漂族”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照顾子女的饮食起居及抚育孙辈,闲暇时间非常少,从而导致缺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机会。

5. 社会地位: 底层社会中的小人物

“老漂族”虽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是他们的户籍仍然留在农村,本质上仍然属于农民。加上他们的流动人口身份和在年龄方面的弱势,导致其财富、权力和声望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十分匮乏,不仅无法享受与城市老年人相同的福利待遇,而且经常在公共场合遭受歧视,从而沦为底层社会的小人物。

在我国,由于社会福利的获取与户籍相挂钩,因而“老漂族”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公共福利仍然保留在家乡,既不能享受“利随人走”的动态性保障,也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的公共性,导致他们陷入一种公共性断裂与失衡的双重困境^[19]。尽管他们也为城市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城市却没有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其切身利益经常被忽视,合理需求经常被无视。一方面,他们被排除在城市居民的行列之外,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慰问,还是精神方面的关心,他们一般都不在被考虑的对象之列;另一方面,城市当中缺乏专门为“老漂族”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机构,遇到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很多具体事项还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才能办理,如异地看病报销等,进一步增加了生活中的不便。总之,他们在陌生的城市中无声无息地活着,是一个很少引起关注的群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趋同性,本能地接近与自己相似的人,而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老漂族”是一个有着较强异质性的群体,他们有着与本地人截然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不仅在言谈举止、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具体差异,而且在公共资源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对于本地人而言,其拥有的公共资源,例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公共卫生资源、就业资源、住房资源等本身就是有限的,外地人是外来者,会与他们争夺瓜分有限的公共资源,这就导致了本地人对外来者的本能排斥。加上“老漂族”在年龄、知识水平、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等方面存在的普遍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公共场合非常容易遭受偏见和歧视,成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社会其中的一个弱势群体。

四、“老漂族”的未来:路在何方?

作为一个拥有上千万规模的特殊群体,“老漂族”的存在必然有其社会合理性。首先,从宏观的国家层面来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特有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是家庭的中心和重心,承载了整个家庭所有的希望,得到了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形塑了“子代权威”的代际互动模式,增强了父母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弹性和韧性,有助于“老漂族”进入已婚子女家庭后适应新的家庭角色和代际关系。其次,从中观的社会层面来看,家务劳动具有非常强的私密性,抚育孩子更是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基于市场逻辑通过雇佣劳动来实现家务劳动和抚育孩子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然而,由于缺乏此岸的契约和彼岸的信仰,中国当下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实际上,中国人的信任半径从未跳脱出家庭的范围,父母和子女是彼此最信任的人。正是这种最原始最基础的信任关系,帮助“老漂族”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陌生城市和社区中生存下来。最后,从微观的家庭关系层面来看,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的代际关系形象的命名为反馈模式,以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接力模式,强调父代抚育子代和子代赡养父代的双向互惠关系。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父代抚育子代的传统,“老漂族”进入城市帮助子女操持家务和抚育孩子,只是延长了抚育时间、放大了父代责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代际关系模式。对于“老漂族”而言,不过是在异地重建的“临时主干家庭”中重拾原有的家庭角色,继续履行自己的家庭职责。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上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相继出台,城市家庭对于子女抚育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只要形塑“老漂族”的各种结构性力量没有消失,他们的规模就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尽管“老漂族”已经开始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大都是着眼于当下,分析他们在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入方面的困境及应对策略,却很少有人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当有一天子女的家庭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老漂族”又该何去何从?

1. 返乡:是否回得去?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即便经过多年城市生活的熏染和洗礼,很多“老漂族”仍然无法割舍和忘却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依旧想着终有一天能够回到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然而,即便“老漂族”打算未来返回故乡,他们是否还能回得去?就目前来看,未来有很多障碍横亘在打算返乡的“老漂族”面前。

首先,身体状况问题。随着孙辈的不断成长,“老漂族”的年龄也会越来越大,身体状况必将每况愈下,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如果回到农村老家,他们的养老问题又如何解决?

其次,生活适应问题。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有着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与子女孙辈朝夕相处,“老漂族”也会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果重新回到农村老家,他们是否还能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

最后,农村社会变迁问题。社会变迁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老漂族”离开农村老家多年之后,农村会不会变得面目全非?家中的房屋与田地长期缺乏管理,是否还能继续居住和耕种?

2. 留城:能否留得下?

“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晚年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尽管对故乡依旧念念不忘,但对于有些“老漂族”而言,与老家冷冰冰的房屋和土地相比,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和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子女孙辈的依恋让他们更加无法割舍,因而愿意继续留在子女的身边。

然而,即便“老漂族”打算未来留在城市,他们是否能够留得下?就目前来看,未来有很多障碍横亘在打算留城的“老漂族”面前。

首先,经济负担问题。“老漂族”大都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农村地区微薄的养老金或尊老金对于维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无异于杯水车薪。城市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钱,如果完全由子女来进行承担,他们能否负担得起?子女的配偶又是否能够同意?

其次,居住条件问题。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里的住房面积往往比较小,居住空间有限。孙辈比较小的时候,大都与父母同睡或与“老漂族”同睡。随着他们渐渐长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届时是否还有“老漂族”的“立足之地”?

最后,社会关系问题。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这也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老漂族”即便能够割舍掉农村的房屋和田地,是否能够割舍掉这些体现其生命意义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老漂族”的未来无论是返乡还是留城,都存在多重困境。如何通过全社会的关注采取多元化的举措来为“老漂族”解决“去”与“留”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未来,对于提高“老漂族”的晚年生活质量、增进其家庭福祉、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必将成为当下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的一个研究课题。

五、结 论

“老漂族”的形成及其发展壮大,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场、社会、文化与国家多种结构性力量对于农村老人的裹挟与形塑,描绘了一幅老年人口流动的生动画卷。“老漂族”对于子女家庭的发展极为重要,正是他们的出现化解了工业社会中进城子女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以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解决了子女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后顾之忧。“老漂族”与其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主干家庭,而是一种“临时主干家庭”或“形式主干家庭”,但正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共同体为农村进城的年轻家庭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代际支持。因此,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功能分析比结构分析更加重要。相对于变动不居的家庭结构而言,以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功能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正是基于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处于多重角色困境之中的“老漂族”才会毅然选择坚守在陌生的城市。对于此种代际支持的深入考察,既要把握中国传统代际关系的特点,又要理解工

业社会对新型家庭结构的塑造,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上反思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韧性与活力。通过对“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老龄问题”。国内学者长期以来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分析“老龄社会”的到来所造成的养老压力,而很少从微观层面深入到家庭内部对老年人的功能展开具体分析。老年人口的增多固然是会导致社会养老压力的增加,但理解中国的“老龄问题”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人口结构的抽象研究上,更应该与家庭结构相结合,在家庭关系中认识和讨论老人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肖景.中国“举家流动”增加 1800 万老年人加入流动人口大军[J].老同志之友月刊,2016(12):14.
- [2] 姚俊.“临时主干家庭”: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动与策略化——基于 N 市个案资料的分析[J].青年研究,2012(3):85-93.
- [3] 毕宏音.“老漂族”: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13(B02).
- [4] 王颖,黄迪.“老漂族”社会适应研究——以北京市某社区为例[J].老龄科学研究,2016(7):22-31.
- [5] 杨芳,张佩琪.“老漂族”面临的政策瓶颈与突破路径——基于广州 H 社区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5(3):10-14.
- [6] 刘庆.“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J].西北人口,2012(4):23-26.
- [7] 郭治谦.“漂泊”:乡村“老漂族”的流动实践——基于山西窑村的个案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864-868.
- [8] 刘亚娜.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6(4):34-43.
- [9] 李成江.城市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J].市场论坛,2005(12):41-42.
- [10] 史柏年.社会保障概论[M].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
- [11] 王伟进.“老漂族”问题及其社会应对[J].中国民政,2015(12):52-54.
- [12] 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71-84.
- [1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8-180.
- [14] 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8.
- [15] 郝亚光.孝道嬗变:农村老人家庭地位的式微——以农业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J].道德与文明,2011(1):118-121.
- [16] 张红霞.城市“孙代照顾”与临时主干家庭生活:石家庄个案[J].重庆社会科学,2014(3):70-74.
- [17] 景晓芬,朱建春.农村迁移老人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5(1):115-117.
- [18] 吴祁.农村进城照顾孙辈的“候鸟式”老人在城生活状况调查——一项探索性研究[J].南方人口,2014(3):51-61.
- [19] 芦恒,郑超月.“流动的公共性”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老漂族”为中心[J].江海学刊,2016(2):227-233.

(责任编辑:陈万红)